

KANGZHAN SHIQI
LAIHUA DE MEIGUO ZUOJIA YANJIU

抗战时期

来华的美国作家研究

郎艳丽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郎艳丽 女，1982年生，四川省宣汉县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留日作家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实践：国家、地方与动漫》《论抗战期间在华居处的美国作家》《“河”“岸”之镜——论苏童小说〈河岸〉中的主体》《记一个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白修德》等。

KANGZHAN SHIJI
LAIHUA DE MEIGUO ZUOJIA YANJIU

抗战时期

来华的美国作家研究

郎艳丽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徐志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研究 / 郎艳丽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14-7807-3

I. ①抗… II. ①郎…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美国—现代②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1937~1945 IV. ①K837.125.6②K260.3③K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034 号

书名 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研究

著 者 郎艳丽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807-3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87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第一章 来华游走的美国作家·····	(1)
第一节 概 述·····	(1)
第二节 新闻作家·····	(7)
第三节 自由作家·····	(27)
第四节 政府工作者和其他·····	(35)
第二章 美国作家来华游走的原因·····	(44)
第一节 游走的欲望·····	(44)
第二节 抗战中国：一个黄金时代·····	(51)
第三章 越界的旁观者——美国作家与抗战中国·····	(85)
第一节 美国作家与抗战中国·····	(85)
第二节 旁观者·····	(133)
第四章 美国作家的中国书写·····	(145)
第一节 抗战中国·····	(145)
第二节 “抗战中国”背后的文化选择·····	(194)
第三节 “他者”中国·····	(213)
第四节 结 语·····	(225)

第五章 美国作家笔下的外国人形象·····	(227)
第一节 外国传教士·····	(227)
第二节 残忍的日本人·····	(237)
第三节 不光彩的俄国佬·····	(247)
第六章 一个巨大的逆转——美国作家的历史命运·····	(253)
第一节 美国作家在中国的命运·····	(253)
第二节 美国作家在美国的命运·····	(261)
结 语·····	(269)
参考文献·····	(271)

第一章 来华游走的美国作家

第一节 概述

从本世纪初叶开始，中国就陷入无休止的混乱和内战之中。在 20、30 年代，日本的侵略战争降临，使这一噩梦愈加险恶。有一大批备受激发和鼓舞的美国作家和记者，到那里去亲身经历黑暗与恐怖。他们是他们的时代派往这一中心之国的使者，承继着马可·波罗和吉卜林创立的传统，把东方的信息传递到西方。^①

——《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

我国香港作家王璞说过，世界上的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纳博科夫那样的，“他们是魔术师。世界只不过是他们耍弄魔术的舞台，而他人甚至他们自己的故事，都是那根魔术师的小棍，不必多加注意。应该细加考察的是他们玩弄小棍和其他道具的方法。一种作家是项美丽这样的作家……法国的萨德，英国的奥斯汀、王尔德，美国的杰克·伦敦，都归于此类。写作是他们生活的体现，所以往往比他们的

^① [美] 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序言第 8 页。

作品更精彩。研究他们的作品就是研究他们的人生；反之，研究他们的人生也就理解了他们的作品。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以至于混为一体”^①。而本书所要研究的抗战时期来华游走的美国作家正是属于后面这一类，他们是简单的、直接的、透明的、率真的，透过他们的作品就能看到他们的人生，而他们人生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因此本书的研究将不仅仅局限于作品分析，作家的生平经历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在进入正式研究之前，笔者依据这些来华作家的职业身份将他们作了简单的分类，共分为三类，分别是新闻作家、自由撰稿人、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他。不可否认这个分类是粗糙的，因为有些作家往往兼具以上两种、三种职业身份，有的甚至更多。抗战期间来华游走的美国作家大都具有欧洲文艺复兴先辈的卓越风采，他们往往横跨多个领域，既是记者，又是作家，有的还是研究学者、情报人员、政府工作者甚至艺术家。

即便如此，笔者依然认为对抗战期间在华游走的美国作家进行分类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三：第一，从方法论上讲，清晰的分类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从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便于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最简要的词组中了解事物的大致轮廓，获取信息。第二，通过分类研究，能够将职业身份相同或者相近的美国作家进行整体观照，从而了解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性。第三，笔者认为尽管有些美国作家同时兼具几个职业身份，但是不管怎样总会有所侧重，适当的归类有利于了解他们的职业身份对创作的影响。

下面笔者就作家的分类作简要的介绍。

在抗战期间来华游走的美国作家中，影响最大、人数最

^① 王璞：《项美丽在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多、也最为耀眼的一个群体就是新闻作家。之所以称他们为新闻作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新闻记者兼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新闻报道均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作家“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他们依据自己的价值目标和情感立场，将客观的新闻素材进行筛选、剪切、重组甚至再创造，营造了一种文史杂糅、虚实共生的叙事效果。弗吉尼亚奥尔德·多米尼大学的新闻学教授乔伊斯·霍夫曼撰写的白修德传记《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的新闻作家写作最一语中的的评价。白修德自己在回忆当时的新闻报道时也谈到，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新闻报道都极富文学的想象功能和修辞色彩，例如中国报纸上报道前线的一个小胜利，就喜欢用缴获敌人“武器无数”来说明，而军队的退却就被描绘为“该军正在进行重大的侧翼包围行动”，当看到“我方已胜利地将敌人诱入陷阱”则表明该城已沦入日军之手。即便如此，记者们也还得“天天都要编造故事”^①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白修德就曾经很成功地编造过金花小姐的故事，在自传《探索历史》中他假装愧疚地炫耀道：

一家中国报纸的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段新闻报导，说的是浙江省某个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了。有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些日本人，随后便逃跑了。我把这个中国名字——黄花进行了意译处理，文雅一点，便变成了金花小姐·蔡，一个游击队首领，一支中国抵抗力量的巾帼英雄。经我这么一发挥，立即吸引了除杜丁以外的外

^① [美] 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籍记者。他们在国内的报社还要发这个故事的照片。新闻部的同事们便提供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于是，她便成了“双枪金花小姐”了。记者们还要，新闻处就发、发、发。几个月来，由于我捏造的这个故事，金花·蔡变成了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影响仅在蒋介石夫人之下。经过人们之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传奇式的了。三年后，我早已不在中国政府里做事了，现在已不复存在的《美国周刊》把她的事迹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那时，我是设在纽约的《时代》杂志远东的临时编辑，当有人建议《时代》应采用这个故事时，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感到内疚。^①

当然，这种“编故事”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白修德身上，抗战时期来华的新闻记者都精于此道。由于国民政府严格的新闻管制，“中国有关当局既不允许记者实地采访，也不容许中国报纸刊登真实情况”^②，这些外国记者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报道指定的事件，这就使得新闻报道的空间非常狭小，再加上战区的遥远，“那场战争远在长江下游的几百英里之外，要经过一周的跋涉，方可到达前线，再经过一周才能返回”^③。不管是被迫也好，懒惰也罢，记者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只得发挥文学想象才能，编造所谓的新闻故事。正如乔伊斯·霍夫曼

① [美] 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② [美] 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③ [美] 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所评价的：“他们笔下的世界并不是原本的样子，而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① 这些新闻作家依据当时的新闻政策、国家的整体利益、个人的信仰立场以及美国读者的口味，将战时中国炮制好，送到美国公众的面前。例如仅仅报道一家中国医院被敌机轰炸是不行的，还必须加上一些点缀，比如那是一家教会医院，里面最好还有几个为民主自由受伤甚至牺牲的美国人。在一番精心修饰之后，读者恐怕很难区分哪部分是属实的新闻报道，哪部分是作家的个人想象了。因此当美国公众在惊呼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如此生动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时，又倍感斯诺创作的浪漫色彩，整部《西行漫记》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哈克贝利·芬的中国式冒险，尤其是红军长征那一部分。而哈雷特·阿班的《民国采访战》更像是一部充满了个人主义英雄色彩的美国大片。所以，后来的评论者一致认为抗战时期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都充满了乐观的浪漫主义色彩。彼得·兰德评价“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记者。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和作家”^②，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抗战期间来华的自由作家并不是很多，主要有赛珍珠、艾米丽·哈恩、海伦·福斯特、W. H. 奥登与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相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自由作家创作的灵活度比较大，他们不再把目光仅仅追随在中国的热点事件和热门人物身上，而是将更多的素材纳入创作的范畴，例如赛珍珠就侧重于对中国农民以及农村的关注，即使是专门为中国抗战而创作的《龙子》，写的最为生动的还是执念于土地的中国农民，除却偶

^① [美] 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胡友珍、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美] 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尔杀死几个来到村里的日本鬼子，我们看不出《龙子》中的林郟与《大地》中的王龙有多大的区别。相对于如火如荼的中国战事来讲，艾米丽·哈恩显然更关注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在艾米丽·哈恩创作的 12 本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她与邵洵美（另外又名“云龙”）生活的点点滴滴，战争在她看来是一件无聊而又没有意义的事情，谁会最终赢得战争，她根本不去关心，所以战争在她的笔下倒褪去了血腥的残忍，显出璀璨的味道：“空中弹片横飞，对空炮弹连连开花。火团一个接一个在夜空飞驰，就好像一群大猫在一块深蓝天鹅绒幕布上飞奔，火光从窗户这边飞到那边，然后爆开成金光流曳的一团。”^①

自由作家的写作受到的约束较少，不会受到政府的严格检查，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与创作才能，而不必在那儿假装真实。他们创作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如赛珍珠的写作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她所知道的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的中国农民，哈恩的写作恐怕更多的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那段暧昧不清的中国感情，奥登与衣修伍德则是为了再写一本关于亚洲国家的旅行读物，海伦·福斯特的写作最为直接，她就是为了要写出赶超斯诺的作品。写作更多的只是他们记录自己某种生活的方式，当然写作也让他们名利双收。尽管艾米丽·哈恩和海伦·福斯特在抗战期间也偶尔充当一下新闻记者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文人自由创作的成果，因此笔者将他们归入自由作家这一类。

如彼得·兰德所认为的，大部分来华的美国人都是一群世

^① 转引自王璞：《项美丽在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原文出自 Emily Hahn, *Mr Pan*.

人眼中“古怪”的人，他们聪明、孤独、充满梦想，同时又多才多艺。如格兰姆·贝克，他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作家，同时他的作品还充满了哲学意味。如埃文斯·卡尔逊，在信仰上他是一位有着严格的苏格兰传统的清教徒，在职业上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美国海军军事观察员，而他的作品则充满了乌托邦似的虚构色彩和宗教热情。最为传奇的要数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他不仅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谍战作家，还被称为美国密码之父，开创了美国的情报密码事业。尽管这些美国人身份不同，职业各异，但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受雇于某个政府机构，例如格兰姆曾在设置在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工作，卡尔逊一直作为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官，而亚德利先是受雇于美国政府，随后又高薪被国民政府聘请来到中国工作，因此，笔者在这里用“政府工作人员”来统称他们。另外，卡尔·克劳虽然曾担任过新闻记者的工作，但是在华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他的广告公司上，所以笔者将他归入“政府工作者及其他”这一类。

第二节 新闻作家

“根据美国著名作家、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 Sonsalis Bury）的说法：当时有‘十多个第一流的美国记者逐日地报道’中国战况。”^①而据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作家彼得·兰德的统计数据，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新闻人员名录至少有三百人，而在华的美国新

^① 郑琴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年—1945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页。

闻机构则多达上百家。^①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怀揣着成功与荣耀的梦想，希望在中国这个异域国度实现他们在本国无法实现的夙愿。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形成一种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中国抗战的“群体的围观行为”。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围观，他们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审视，才给当下的人们提供了关于中国抗战的另一幅图景。

由于抗战时期活跃在美国新闻作家人数较多，而笔者的精力有限，不能逐一地详细介绍，因此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首先会依照重要性和典型性原则对作家进行筛选，然后再结合他们的生平经历，并按他们来华时间的先后顺序作简要的梳理，以期形成关于美国新闻作家来华活动的大致轮廓。抗战期间活跃在中国抗战第一线的美国新闻作家主要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白修德（Theodore White）、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伊罗生（Harold Robert Lsaac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高尔德（Randall Chase Gould）、安娜丽·雅各比（Aunalee Jacoby）。当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被中国人民铭记，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始终如一的友谊和立场，例如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福斯特；而另外一些人则时运不济，尽管在当时他们也曾叱咤风云、红极一时，但却由于信仰、立场等各种历史原因，逐渐被人们淡忘。

^① 《美国在华新闻人员名录》，[美] 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在这些作家中，有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那就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欧文·拉铁摩尔，他甚至能听懂蒋介石那口让属下也头疼的宁波话。拉铁摩尔不仅是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还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同时也是中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和汉学家。与赛珍珠一样，作为传教士儿童的拉铁摩尔早在1901年刚1岁的时候就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由于他的中国成长经历，他对中国的报道常常极富深度，连蒋介石也称赞他相对于宋子文这样的洋博士来说，在考虑问题方面更像个中国人。拉铁摩尔一生博学多才、著述丰富，主要作品有《满洲：冲突之摇篮》《亚洲解答》等。

除拉铁摩尔外，到中国最早的是一位以“执拗”著称的报社编辑兰德尔·蔡斯·高尔德（Randall Chase Gould），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可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人来讲却是一个经常出现而又令人头疼的名字。高尔德于1924年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中国，担任英文版《北京日报》的副主编，并兼任美国合众社驻北京通讯员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特约记者。在北京时他就因不顾劝告执意报道美国“国务院已训令马使勿参加列强之哀的美敦”^①的消息而使“使馆受窘”，从而被勒令禁止进入美国使馆参加新闻会议。1931年高尔德到上海《大美晚报》供职，并于次年因真实报道了日本人在上海对中国人的大屠杀而受到日方的问责。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尔德更是利用他《大美晚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报纸上对日军野蛮的侵略行径进行讨伐。尤其是上海沦陷后，他更是“刊发大量有关报道和评论，

^① 陈兴来、李花：《“执拗”的资深报人——〈大美晚报〉编辑高尔德研究》，载《今传媒》，2012年第7期，第143页。

鼓舞了当时沦陷区上海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①。1940年7月14日，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训令伪上海市政府，与各外国驻沪有关机关交涉，驱逐上海租界中新闻报业的七名西方著名人士离开中国。‘以外国身份而参加颠覆国民政府之阴谋，并公然为破坏国民政府之言论行动……日夜造谣生事，以期危害民国……为中国法律之所不容’，令伪上海市长‘迅即与各国驻沪关系当局交涉，对此等分子严定期限勒令出境’”^②。1941年，高尔德被迫离开中国。1943年为抢占新闻制高点，高尔德回到中国，并于当年10月奔赴抗战陪都重庆主持英文《大美晚报》重庆版的编撰工作。然而国民政府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让高尔德备感压抑，他幻想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大美晚报》于1945年6月25日再度停刊。高尔德最终将他的中国之行付诸笔端，并于1941年和1946年出版了《今日重庆》（*Chungking Today*）和《引人注目的中国》（*China in the Sun*）。

随后抵达中国的是高贵而执着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小姐。斯特朗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25年。她由莫斯科返回美国途经北京时，遇到了范妮·鲍罗廷。这位共产国际驻国民党顾问的妻子说服了她，使她觉得有必要去革命的广州看看。然而当时广州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她仅在这座罢工的城市逗留了几天，然后仍按原计划继续上路。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则是1927年“四一二”上海政变发生之后。《中国大众：

① 陈兴来、李花：《“执拗”的资深报人——〈大美晚报〉编辑高尔德研究》，载《今传媒》，2012年第7期，第143页。

② 陈兴来、李花：《“执拗”的资深报人——〈大美晚报〉编辑高尔德研究》，载《今传媒》，2012年第7期，第144页。

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她在汉口期间，用大量时间采访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驻国民党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以及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李立三等人的情况。斯特朗抱着对共产党人极其友好的观点，盛赞中国革命充满希望，并充满自信地预言中国的未来始终是掌握在觉醒了的工农大众手中的。此后直到1938年，她才又一次来到中国。她首先抵达汉口，在采访了蒋介石夫妇以后便动身去了前线。1938年1月，斯特朗在山西西北的八路军司令部逗留了10天，并在这次匆匆访问中国之后写作了《人类的五分之一》。在该书中斯特朗不仅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1940年12月，斯特朗从莫斯科飞抵重庆，开始了她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她在中国这个战时的陪都逗留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她看到了重庆政府的专制以及人民生活的痛苦，并预言中国很可能发生内战。从1925年第1次访华到1970年在北京逝世，斯特朗共访问中国6次，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斯特朗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她总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

紧接着登场的是美国记者群中最闪耀的明星哈雷特·阿班。阿班于1926年来到中国，当时他已逾不惑之年，这个在美国报界已经足足浸淫了21年，频频跳槽，最高职位已经做到总编的中年人，因为“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日子”，便突发奇